

社会变迁与现代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SHEHUI BIANQIAN
YU XIANDAIHU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费孝通◎主编

李友梅 朱学勤 沈关宝 李向平◎副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社会变迁与现代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费孝通
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2. 7
ISBN 7-81058-338-7

I. 社... II. 费... III. 社会变迁-关系-现代
化-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8641 号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5 字数 440 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50
定价: 40.00 元

社会变迁与现代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 委 会

主 编 费孝通

副主编 李友梅 朱学勤 沈关宝 李向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学勤 李友梅 李向平 沈关宝

费孝通 耿 敬 章友德 董国礼

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

(代序)

费孝通

人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正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一个由知识、信息和智力为主导的 21 世纪。我们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者,处在世纪之交,无不感受到我国的社会和文化也在经历着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实际上,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知识信息社会已经有了各种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使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想象能力已经面临着许多挑战,就像我们在理解当今社会的复杂性时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越来越感到必须要加强学习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是试图更好地把握时代变化的大趋势,并希望走向时代发展前沿的,那么我们肯定是有必要经常检查自己所作的研究能否贴切地反映现实社会。可以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举办“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这种形式请大家来互相交流各自正在进行的有关研究,特别是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的新思考。我想这次会议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对自已新思考的有效性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应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理论;第二,只有把社会科学研究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理论;第三,如何充分地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何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有利于社会理论发展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近 10 年来,我们已经明显地体验到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了,急需信息的获取和信息准确性的识别越来越困难了,人类合作的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方式更加灵活了,结构和规则的重建更加频繁了。我们似乎是突然发现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不好理解了,用以分析这种现象的工具也不够了。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的确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确立我们的学习方法。

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我们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我们是否把握了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是否明白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到底有多少差距,以及我们是否恰当地运用了这些理论。

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理论也不是对所有社会现实都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功能,西方社会理论也不例外。西方社会理论的产生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们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自己的社会现实中,深入调查研究,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的结果。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变化着的现实社会了解的不断深入,他们会反复修正其社会理论,以使这一社会理论更符合其社会现实。当我们运用西方社会理论来认识或解释我们的社会实践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采用的西方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所摒弃了的理论,那么,我们怎么又能运用这一理论正确地指导研究呢?我们的研究结果又怎么会符合实际呢?即使我们采用的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解释他们的现实社会时正在运用着的理论,也不一定就能恰当地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

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由于我们视野的局限性,我们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可能会缺乏全面的了解;由于我们与西方社会科学家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同,即使对后者的理论有较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其理论所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有较深入的认识。而当前我国的学术界受到急功近利倾向的影响,在进行某项社会研究时,往往会把偶然遇到的西方社会理论拿来指导我们的研究,而不是对这一理论的形成进行详细考察之后再作出选择。正由于此,我们的社会研究成果往往会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或不符。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在这个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简单地把西方社会理论拿过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必然会漏洞百出。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并非所有的西方社会理论都能应用于中国实际。这要求我们有一个恰当的对待西方理论的态度。在采用西方的社会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不能全盘照搬。我们学习西方社会理论的目的,是为创建自己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些理论参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弄懂西方社会理论的性质,然后才是消化、吸收,促进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急剧变迁的年代,一切都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许多社会现象都转瞬即逝,使人无暇思考。当我们试图理解或认识某类社会事实时,往往仅作一些现象的或者行为的分析,而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所总结出来的理论,是肯定

不扎实的。虽然浮躁性渗入到当今的理论研究中,是社会现实的客观使然,但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在主观上努力去克服这种浮躁性,不过要克服这种浮躁是需要某种相应的方式的。这个变化的时代,已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能性。为使这些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反应和感悟当前时代变化的方式和趋势,要能够有效地判断这个变化对中国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要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去反应这个影响带来的结果。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此需要对之做历史的考察。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也必须要到她的传统中去寻找根基,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按照其自己的“游戏规则”运行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社会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正确地了解该社会的现实。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实际社会运行逻辑的研究,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果我们不对中国的社会传统有比较充分而清晰的了解,我们就不可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吸取传统中的精华,是我们发展、完善社会理论的基础,怎样运用好传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在一份关于景德镇陶器研究的报告中,得到了同样的启示。中国从唐宋开始向国外输出陶器,到明末清初达到了高潮,那时的欧洲贵族们无不以能得到一件景德镇的陶器而感到荣耀。景德镇陶器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它对世界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现今的景德镇陶器制造业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它的窑已经从传统的柴窑改成了瓦斯窑,对温度的把握也不再是凭经验和肉眼,而是用科学一起来加以测试;而景德镇的现代陶器也是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前提下,反映了创作者的新的艺术思想和新的时代观念。这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最好继承。

从这件事里边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离开它自己的社会实践就很可能丧失它的生命力。

其实,在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将西方的社会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加以结合,从而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是有着一些较为成功的先例的。中国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范例。

我这一生从20世纪初开始,已经经历了90个年度。在我晚年还能有幸踏进21世纪。因此我经历了人类文化社会的两次重大变动。第一次是19世纪,从欧洲开始用蒸汽推动机械生产的时期。第二次是近20多年来在美国开始的用电子计算机促成的信息时期。在这两次重要的变迁中,我从小在传统文化社会里生长大,然后进入这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作为一个文化社会人类学者,我有意识地紧

紧跟着这一系列的变动。在生活中接受一系列深刻的感受。我较早就明白,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不能不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变迁而变动,我们必须推陈出新才能适应我们的客观世界。在这个变迁中,许多传统的生活和思想不能不逐步改变,如果完全按照传统办法是无法取得生活上的满足的。同时我又感到我从小学到的传统生活方式还是我这一生遵循的生活方式的主流,传统的思想模式还一直是我进行思考的基础。我无法从零开始重新采取一套完全新的文化和社会方式来进行我的生活。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传统传下来的文化和社会之中,这个矛盾也许是在我这一代人最深刻的经验。

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话,都是出于我切身的经验。我们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认识到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切不可脱离实际,凭主观去思想和行动。我认为我们只有从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新旧矛盾出发来认取我们研究的问题,并采取科学的态度和观察客观的历史发展的事实去理解现象,总结客观演变,看出新旧交替的规律,作出我们生活前进的策略。人类的文化和社会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为自己服务的。人民群众是创造文化的源泉。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吃尽了苦头,走出一条自救的道路,也是由中国人民大众用自己的智慧一点一滴地创造出来的。我们一路走过许多弯路,但是终于找到了一条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和实现理想的路子。我们是用实践来验证我们所作出的选择。我认为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步步联系实际,来总结人民大众所创造的经验,以实效为选择的基础,去摸索我们适应这个变动不居的历史发展,以获得我们认为满意的生活方式和前进的道路。

最后,我应当向与会的朋友们道歉的是,我作好准备要来参与这次会议之际突然生病,进了医院。遵医生嘱咐不能远行,因此我很失望,我不能来参与这次会议了,因而失去了向朋友们领教的机会,千万请大家原谅。

2000年5月20日

前 言

世纪交替的今天,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继降临并交互作用,构成对中国社会既有秩序、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的严峻挑战。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全球化、民族主义以及民主危机等大主题与社会成员的普遍的个人焦虑不安,都亟待理论层面的积极回应。但是,当我们试图解析现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并重新建构一个干净文明的社会时,我们深感困难重重与力不从心。因此,完全有必要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力量,超越部门利益与旧有意识形态的框框,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展开研究,以解析现时发生的一切。正是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甫告成立便决定举办“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社会学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议社会良性运行之策略。

经过近半年的筹划准备,会议于2000年5月20日至21日在上海大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来自欧美、东南亚和港台地区的学者与大陆学者一道,对全球化、现代性、乡村社会变迁、城市社会发展、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本次会议共收到与会论文一百多篇,经过专家们的认真选择,本书精选了其中的三十余篇,分别编为五个部分。

文集的第一部分——社会理论研究——共收集了八篇论文,探讨了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的几个最重大的理论议题。第一篇论文的作者赵刚先生是台湾地区的知名社会学者,他对社会学的一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明——由一位深受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以批判为立场的激进社会学家米尔士提出的“社会学想象”——进行了深刻反思。米尔士首先提出“社会学想象”这个历史社会学的观点,与当时社会研究中遍存的“阉割历史”、“形式主义”与“杂烩式研究”等倾向相抗衡,为批判社会学的重建奠定了基础。在论文中,赵先生以思考“社会学想象”在当代的批判性意涵为基点,首先着力勾勒出二战后50年代美国政治—社会思想的核心——“自由派共识”,然后将米尔士的“社会学想象”与之比较,详析其针锋相对处。更精彩的则是在文章的结尾,赵先生把“社会学想象”与新自由主义的关联与分歧进行了精当的分析。

自韦伯以来,社会学关于“理性”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但是,首先把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纳入理性研究范畴的则属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德胜等几位先生。在收入本书的论文中,他们走出文史哲的思辨范畴,以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检视中庸理性在中文世界日常生活中的深刻影响。在分析了现代社会面对的理性吊诡与“沟通理性”的缺陷后,文章对中庸理性的特质作了探讨。在“中国人”的中庸取向部分,作者以实证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一些很有趣的现实。

和“理性”相比,现代性是一个更加流行也更富有争议的术语。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钱永祥先生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正是有关现代性的研究。钱先生由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对比出发,首先区别了现代性与现代化这两个相貌酷似的概念,指出内部蕴涵着丰富的批判能量的现代性的承载者是自由主义而非其他。他认为,“正视现代性的真实内容,乃是维持社会改造的动能、维持社会进步远景的重要一步。”

在当代世界上,深刻影响现时代的,除了现代化外,还有全球化问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地球村”的说法越来越名副其实。如何参与、应对全球化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瞿宛文先生的《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对全球化现象及其体制的变革进行了梳理,对近年来影响深广的修正学派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言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对于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说,全球化是一个坚硬冷酷的存在;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后进国的救世主不是别人而是后进国自己。

乔治·里茨尔关注了罗兰德·罗伯逊的最新观点,用“麦当劳化的观点”和“新消费方式”去检验他的几个观点,从而分析全球化理论的一些优势和弱点。北原淳关注点在于,亚洲社会正走向新阶段的转折点,我们应该考虑形成“市民社会”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包括亚洲社会正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一些弱点和问题。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亚洲不能解决社会阶层、城乡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差别和相互歧视等三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在将要到来的21世纪中作为全球公民幸存下来。为了在亚洲社会产生出真正的公民和市民社会,我们应该解决上述三个领域的问题。

李景阳论述了“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的特征,他认为过渡状态是一种旧体制被否定或部分被否定而新体制尚未形成或尚未发育成熟的中间性质的社会状态。这个转型时期,是一种政治的震荡时期,社会的探索时期,经济的重构时期和思想文化的反省时期。他的讨论对于研究转型时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章友德在《传播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通过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史,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

实:1949年以前,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由于种种制约性因素,无论从传播范围、传播效果等方面都不足以构成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良性驱动;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尤其是1978年以来中国面向世界的重新开放,使西方文明通过现代传媒在中国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导致今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场仍在延续的变迁,必将对未来中国获得与其古老文明相媲美的地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文集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九篇关于城市问题研究的论文。李强的论文研究市场机制下影响收入的因素,分析的视角是公平问题,分析的理论模式是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他认为我国的市场改革已经有20年了,但迄今为止,在决定收入时,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先赋因素。作者预言,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拓展,随着阻碍流动因素的逐步解体,自致因素在决定收入中的作用会逐步上升,而先赋因素的作用会逐步降低。

随着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断壮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凸显,围绕社会稳定这个社会学的永恒主题,学术界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丁元竹近年来潜心于中国社会稳定状况的跟踪分析与对策研究,在相关领域颇有建树。他的文章围绕就业(充分就业)这个核心,对就业有关的收入、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相关分析,试图从就业与社会保障这个独特视角审视中国的社会稳定状况。文章认为,1999年,我国城市社会形势基本稳定,但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巨大”。丁教授还着力探究了在城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其对策。

顾骏则将视野投向社区建设这个目前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热点。他的文章简要而清晰地分析了目前我国的社区建设的独特性格及其国际可比性,认为重新组织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社区发展的共同基调;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结构背景是过度组织化,而非他国的“欠组织化”,由此也使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一开始便陷入了“政府依赖”的两难境地。顾先生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社区的社会发育的过程,更是一个社区的政治成熟过程。因此,政治社会化才是我国社区发展的真正起点。

同样是出于对市场化冲击的关注,卢汉龙的视点则落在微观的消费者自主性这个命题上。他的论文从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社会形成的冲击开始论说,然后运用在中国不同城市所作的消费者文化研究的资料来分析论证消费者自主性的增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增强又会自动加速中国社会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化。卢先生认为,消费者自主是市场经济导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附加条件。

黄绍伦、孙文彬关注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大陆家族产业、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章概述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与运行

方式,并提出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家族企业,才能更好地理解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以及生意法则、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

随着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也从传统的单位体制中走出,实现了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如何通过社区动员、社区组织、社区参与,使分散孤立的个人联系起来,使不同利益、不同职业、不同角色的社会人群得到新的整合,形成对社区公共利益的自觉认同,形成具有归属感的“社区共同体”;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徐中振教授提供的论文中所思考、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同时,徐翔则以社会资本的概念入手,认为需要对社区建设的社会功能和体制性安排进行再认识,并论述了社会资本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民主的政治稳定是十分脆弱的。通过基层民主建设进而推动国家民主进程,不失为一条适宜于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多年来,李友梅教授致力于对上海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意义的对策思路。《浅论城市社区组织关系重构》一文通过对上海城市社区组织关系现状的考察,对社区的民主建设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该文着重指出:基层民主建设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和社区发展的必然要求,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则是进行基层民主建设的组织条件;当前我国的城市社区组织关系的状况难以适应基层民主建设提出的要求,具体表现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等基层政府组织和社区层面组织之间的关系不顺,削弱了基层社区群众性组织的自治性,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这种情形使得“市民社区”的发育具有一定的难度,以致阻碍了社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进行社区组织关系重构以推进社区发展。

仇立平的研究素以实证见长。他的论文立足于对马克思与韦伯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比较分析,从职业地位这个“社会分层的指示器”入手,对上海的社会结构与分层进行了考察,认为目前上海社会存有五大界限比较分明的阶层,并由此引发了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中间阶级及其形成的标准以及市民社会及其赖以形成的市民阶级结构等有关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的一系列思考。毋庸置疑,仇先生对社会阶层的关怀从根本上源于市场化的巨大冲击。

本文集的第三部分——农村问题研究,收录了六篇论文。近20年来的中国,由工业化引发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农民与农民的后代仍占据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的社会事实。“三农”问题在目前中国具有一发千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

题”。如何解释、导引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发展？这六篇从不同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的文章，对于理解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20多年的人民公社，是迄今为止中国农村生活中最壮观也最富悲剧意义的画面。“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制度安排一度激动了无数人，但是，在现实面前，它终于显出了乌托邦的本色与实践的不可能性。然而，就在人们痛下决心“告别理想”并纷纷践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河南的南街村却高扬集体主义与人民公社的大旗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毫无疑问，如此“共产主义实验”的成功，在今天的社会结构背景中，有着巨大的震动力，引起了官、学、民三方的广泛关注。刘倩女士得地利之便，对南街村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她的收录本书的论文是其对南街村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文章探讨了改革开放后南街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以及变革过程中村庄与地方政府、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分析了该村内生结构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刘女士的论文指出，正是人民公社制度遗产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今天的亦新亦旧的南街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刘女士也敏锐地发现，南街村行政运作过程中，有着十分明显的拟家族行为色彩，认为这其中的封建性、专制性与人身依附性对于农民健康独立人格的形成，对于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具有不容忽视的束缚作用。

和刘倩的研究一样，周大鸣的文章也是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但周文的落脚点则完全不一样，它指向的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尚无终结的主题——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持续不断，可是，乡村文化的失调却也持续至今。乡村社会的重建之路何在？周先生的文章通过对广东凤凰村——“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的田野调查，讨论了乡村社会在教育、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变迁情况，并以此分析农村社会价值和道德重建的紧迫性以及乡土社会重建过程可以从儒家传统和自由主义中汲取的资源。论文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论点，比如，他认为在中国的农村社会“原有的制度和观念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只要有某一部分复活，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传统在中国农村社会“复兴的阻力并不大”等等。

何军、叶依广的论文结合了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通过对江苏省不同社区农村住户经营行为的对比分析，反映了当前江苏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社区在非农化与市场化进程中，农户经营行为的特征、从兼业化到专业化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为今后农村微观经济的良性发展，加速农村社区的非农化进程，提出

一些政策性建议。

郭强、王国平的论文论述了知识经济是在信息经济的母体中产生并以知识化尤其是以经济知识化为核心内容和基本目标,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苏南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包括由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所组成的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

风笑天、张青松的论文则以近20年来的各地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实证调查资料为根据,从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两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的变迁进行了描述,并对生育意愿变迁的滞后性、内部失调性和诱导性等问题作了讨论。

董国礼的《集体化土地产权安排的制度环境分析》一文,则以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为理论工具,分析了中国集体化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制度环境,揭示了集体化土地制度安排的制度背景和变迁的制度逻辑。

文集的第四部分辑录了三篇关于探讨企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论文。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法国人类学家伯纳·甘提交的是一部人类学影片:“面对面”,它旨在描述两个世界的一次会面:中国的制造界和法国的工业界。这部影片向人们展现了设立生产基地的过程,并尝试提供一个洞察这次操作进行时显现出的误解、目标交叉、不理解和交流失败以及超越语言达成一致和共识的现象的视角。杨俊一的《企业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从企业制度变迁入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总结了企业制度变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要素变迁的影响,并进而探讨了中国式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特点。而张乐天的《面临新世纪挑战的温州》一文,则运用田野调查的资料,敏锐地发现温州在创建现代社会的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如产业结构的调整,调整时市场、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昭示着现代私营企业所面临的一般问题。

文集的最后一部分辑录了有关宗教社会理论研究的三篇文章。其中,李向平的论文给我们清晰地勾画了宗教与民族、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民族宗教主义本身并非恶魔,其危险性仅仅在于它常常成为民族主义与国家权力结合的精神价值基础的“包装工具”;构建具有世界宗教性质的“公民宗教”是挽救国际社会于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的必由之路。谢燕清的论文则直接切入到宗教社会学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讨论了社会学经典理论时期,韦伯和涂尔干所开创的宗教社会学在现代化问题上的基本论题:涂尔干侧重政治社会的层面,而韦伯则比较全面地从经济和政治两个侧面探讨了宗教和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问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理论界的表述着重于资本主义的起因和产生的问题,而韦伯和涂尔干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预示了现代社会学在宗教与现代化关系上种

目 录

社会理论研究

现代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科)学

——重思米尔斯“社会学想象”的当代批判意涵…………… 赵 刚(3)

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

…………… 张德胜 陈海文 金耀基(28)

现代性还有批判意义吗…………… 钱永祥(44)

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 瞿宛文(54)

全球化理论：麦当劳化输出及新消费方式的教训(摘要)

…………… [美]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72)

展望亚洲的市民社会…………… [日]北原淳(77)

试析“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 李景阳(86)

传播与中国现代化…………… 章友德(94)

城市问题研究

影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 李 强(107)

城市居民的收入与社会保障状况…………… 丁元竹(117)

过度组织化：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结构背景及其社会学意蕴…………… 顾 骏(130)

消费者自主与社会分化…………… 卢汉龙(136)

中国家族企业：初步观察和比较研究…………… 黄绍伦 孙文彬(152)

社区发展中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

——关于“单位人”(自然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的思考… 徐中振(159)

论社会资本对城市社区建设的意义…………… 徐 翔(172)

浅论城市社区组织关系重构	李友梅 石发勇(180)
职业地位: 社会分层的指示器	
——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报告	仇立平(196)

农村问题研究

人民公社制度遗产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一个中部中国集体所有制村庄的田野调查	刘 倩(221)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与文化重建——以凤凰村为例	周大鸣(249)
从兼业化到专业化: 不同社区农村住户经营行为的比较研究	
.....	何 军 叶依广(265)
知识经济条件下苏南现代化推进的基本路径	郭 强 王国平(276)
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	风笑天 张青松(291)
集体化土地产权安排的制度环境分析	董国礼(310)

企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面对面——一篇用影像记录的社会人类学论文(摘要)	
.....	[法]伯纳·甘(Bernard Ganne)(323)
企业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	杨俊一(326)
面临新世纪挑战的温州	
——关于温州企业调查的几点思考	张乐天(339)

宗教社会理论研究

宗教文化与当代民族主义三题	李向平(351)
宗教社会学与现代化问题	谢燕清(359)
宗教精神与社会民主——试论托克维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耿 敬(370)

社会变迁与现代化

社会理论研究